

清代乾隆年间，在北京南城有处院子，环境清幽，群贤毕至，品茶会友，纪晓岚等人也经常到此赋诗畅聊……这里，就是河间文人雅士欢聚的处所——河间会馆，又称“古瀛会馆”。

北京曾有座河间会馆

赵华英 杨静然

◆ 兴修会馆 惠及学子

北京兴修会馆，始于明朝早期，到了清代更为盛行。最早会馆，称为“试馆”，原本是为了接济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乡学子，方便他们短期住宿、互帮互助，所以称为“会馆”。

这些学子，大多囊中羞涩，在京的故里乡绅或者京官就主动捐资、置地建房，免费供学子们居住。后来，会馆又逐渐成为同乡官员士人定期聚会、联络乡谊的场所。据统计，至清朝末年，全国各地在京城设立的会馆一度达550余座，宣武、崇文一带，各省市的会馆云集，蔚成一景。

直隶省因为邻近京城的缘故，一直少有会馆设立。顺治年间，曾有直隶省在京人士选定区域建立了一间会馆，可时间一长，就因为失于管理而废弃了。

乾隆年间，京城有位叫舒成龙的官员，是河间府任丘县人。他的祖父曾在会馆居住，后来会馆破旧荒废，想将其修好，但一直未能如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舒成龙想到祖父的遗愿，于是，带头捐献白银千两，购买了一座旧宅，作为“河间会馆”。

为了把会馆建得像模像样，舒成龙亲自督促施工。钱不够，他就各方筹措。最终，一个包舍厅堂2间、房屋72间、杂舍35间的河间会馆修建而成，房屋多达110间。

会馆内白土刷墙、红粉装饰，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凉亭，购置了各种厨灶器具。如此规模的会馆，既能接济来京赶考的河间学子，也给河间籍文人墨客在京欢聚宴饮提供了一个好场所。

会馆建起来容易，但日后的经营管理是个问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春，舒成龙从山西雁平道卸任归京，来到河间会馆，发现房屋已经有些破旧，有的房间破裂倒塌，屋内器具也被损坏。看着自己亲手建成的同乡会馆破旧不堪，他喟然叹息，立志修缮，但因为有其他事没能立刻实行。

两年后，朝廷开科取士，各地学子即将来京考试，河间会馆又要派上用场了。舒成龙又起了修缮的念头，可盘点一下会馆的家底，实在有些惨淡。无奈之下，他不得不从当铺预支了房租，又借发了两千白银，带病来到了会馆，然后召集工匠、准备材料，补造器具、增建房屋，糊裱油饰、日夜赶工，终于使会馆内外焕然一新。

之所以如此加紧修缮，是因为舒成龙生怕因为食宿不周，耽误了河间府的士子们进京赶考。

会馆修好后，7月份，河间府士子进京，仅住进会馆的就有300余人。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士子不能住宿于此。于是，舒成龙又在附近购置了一间房舍，加以改造，建成会所，对河间府来京的人开放。如果赶上科举，应试者优先入住。

几代人与铁狮相依相伴，见证了铁狮的铸造过程、风雨沧桑；一家人对铁狮充满感情，分别之际在铁狮前合影留念——

千年铁狮见证融融亲情

白世国 齐斐斐

沧州市旧州镇东关小学教师敖国军，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75年、以千年铁狮为背景的照片，照片定格的是一家人的血脉亲情。

拂去时光的蒙尘，敖国军徐徐道来照片背后的真情往事。

上世纪70年代，受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电影的影响，敖国军的三叔敖玉才自小崇拜军人，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上初中后，敖玉才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一看到村里有人参军入伍，就羡慕得不得了。

1970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公社传来征兵的消息，敖玉才顾不得把饭吃完，就第一个跑到大队报名。他有文化，家庭成分好，劳动积极，总是抢累活、脏活干，给大家的印象很好。入伍名额是由公社按大队分配的，东关大队只有4个名额，大队干部一致推荐了他。体检、政审一切顺利，他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送兵那天，公社干部给他戴上大红花，派出马车，一路锣鼓喧天，欢送新兵去县城，

◆ 学子感念 名流支持

从此之后，河间的学子到访京城便有了安身之所，可以直接入住河间会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河间府的200多位士子举人们感念于舒成龙“敦笃乡谊、不忘桑梓”的美意，特地刻碑立石，感谢他对河间士子的奉献。

碑记资料表明，舒成龙的“会馆工程”曾得到河间府众多名人的鼎力支持。这其中，戈涛、边继祖、纪晓岚、李中简，还有戈涛的弟弟戈济，其才气都在京城名闻一时。

会馆建立之初，没有固定的管理者，由河间府在京任职的官员轮流管理，称为“值年”。但是，担任“值年”的官员往往因公务繁忙，顾不上会馆的管理。于是，舒成龙与几位同乡好友商量，请一位专职“馆长”常住馆中，执掌馆务，名为“值客”。

从账目收支、房租到年度修缮、勘估物料，日常事务由“值客”管理，“值年”仅负责审核，修缮等大事仍由舒成龙酌情定夺。会馆还设立“登名簿”，对往来会馆住宿的河间府同乡，逐一进行记录。

边继祖、纪晓岚、李中简等人亲自拟订了《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对会馆运行、住客管理均定出详细规章，以为后人遵守。

《规条》指出：会馆原为参加乡

◆ 古瀛会馆 旧址寻踪

那么，河间会馆的旧址在哪里呢？

在科举时代，会馆曾为河间同乡送往迎来、节日聚欢乃至于商量善事义举的知名之地。但在科举停办后，逐渐成为杂居之所，与河间也失去了联系。然而，最近几年来自北京市的会馆资料，提供了关于河间会馆的一些零碎线索。

在北京原宣武区菜市口东面，有个骡马市大街，明清时期是兴盛一时的骡马交易市场。骡马市大街以南，有很多始建于明代的老胡同，胡同里曾云集着全国各地的“驻京会馆”。在这些胡同中，有一条南北向西偏斜的胡同，名为果子巷。明清时期，这条小巷的南北段有很多售卖干鲜果品的店铺，所以称为果子巷，当年的河间会馆就在这条小巷里，又称为古瀛会馆。

明清时期，北京城区划分为“五城”，即：“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每城下辖若干个“坊”，河间会馆即位于南城的“日南坊”。有资料显示，河间会馆的具体位置在果子巷69号。也有资料称

再乘火车去宁夏服役。那个年代，入伍比现在考研的轰动效应还要大。

一人入伍，全家荣耀。大队把一块写有“军属之家”的红色光荣牌挂在敖家门楣的右上侧，光荣牌虽小，但含义深刻，承载着至高无上的荣耀。生产队对敖家格外照顾，不时还有学生来帮助扫院子、挑水。在革命家庭的光环下，全家人特别自豪，生产格外有劲，生活充满阳光。

1975年夏，三叔敖玉才的祖母病危。家里给在外的亲人们发出加急电报。敖玉才闻讯，急忙请了假，连夜从宁夏赶了回来。与此同时，远在沈阳、北京的二爷、三爷也匆匆返乡探视。二爷是三年困难时期，为谋生计背井离乡远走东北的，落户于沈阳。三爷是中医，少小离家，在北京一医院坐堂应诊。

几天后，祖母病逝。送别老人，二爷、三爷、三叔即将踏上返程，刚刚团聚一家人又要远隔天涯，不知何年再相聚。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在村西的铁狮子旁合影留念。当时正是一场大雨过



试、会试的贫寒士人以及在京等候官职的候补、候选官员而设。京官入住馆内，不得常住在此，更不得携带家眷入住。如果赶上乡试、会试，所有入住的候补官员都应移出会馆，让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优先住宿。

此外，《规条》还对在乡试、会试中取得功名、官职的人规定出不同的

河间会馆在果子巷77号，曾作为北京宣武区房管局办公地点。这些线索，还需要进一步访查、考证，方能确认。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宣武区政府对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进行盘点测量，出版了《宣南鸿雪图志》，其中也记载说果子巷有古瀛会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里《河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各郡县馆房地产清册》(1951年)中记载：“古瀛郡馆 宣外驴驹胡同六号 市亩 3.263 共楼房瓦灰房三十五间 同乡分住无租 古瀛郡馆 琉璃厂二四八号 武学书店租用 仅有地皮权”。说明到此时，河间会馆仍保存了多个院落。

驴驹胡同是一条很短的胡同，在地图上如同“对勾”一样，北口与果子巷延续，这条小巷好似一段烟筒的拐脖子，北南段与东西段合并不足百米，北南段叫果子巷，拐角向西叫驴驹胡同。前述记载的河间会馆门牌编号，出现了“驴驹胡同”与“果子巷”两个版本，可能是因为南北方位不同造成的。

后，田里的庄稼正茂盛。铁狮昂首立于水中，雄姿勃发，见证了一家人的融融亲情。照片后排自左至右依次是二爷、三爷，他们头戴草帽，虽居于城市，但农民本色不改。前排左侧，身着戎装、精神饱满、风华正茂是敖玉才，前排右侧是敖国军的父亲。

即将分离的一家人，为什么选择以铁狮为背景留存纪念呢？

在沧州，或许还没有哪户人家比旧州东关的敖家对铁狮子的感情更为深厚。早在西汉初年，敖家人就在此地居住，子孙绵延，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铁狮的铸造过程，并与铁狮相依相伴。明建文年间，一场叔侄争夺帝位的战争，使得整座城池几乎被屠戮殆尽。一户敖姓人家躲藏在土城下的洞穴中，幸免于难。血雨腥风，敖家人没有选择逃离，因为念着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故土。一切从头开始，在焦土上建起房屋，迎春送雪，繁衍生息。

故里风物皆乡愁。经历的磨难，使得世世代代的敖家人无论走多远，都念

捐款数额，以接济同乡贫寒之士或遇有突发事故作接济之用。

北京虽然会馆众多，但因为年代久远，流传至今的会馆规章已经不多，这份《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及《河间会馆值年值客规条》出自《北京市会馆档案史料》，是研究会馆文化的重要档案。

遥想京城当年，纪晓岚、戈涛等人在河间会馆，不时小聚、共叙乡情。

明清时代，河间府的读书人来到偌大的北京城，或许觉得举目无亲、事事难办，甚至吃不起饭、住不起店。但在河间会馆，各位同乡找到难得的熟悉住所，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油然而生。悠悠数百年，不知多少贫寒的读书人因为河间会馆提供吃住，才度过艰难之日。

河间会馆甚至成为河间士人一个重要的对外联谊平台。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曾国藩曾移居果子巷居住。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曾专门拜访河间府肃宁人苗仙露，称苗“河间人，精六书谐声之学”，并对河间“君子砖”产生浓厚兴趣，很可能就是他在果子巷居住期间，通过河间会馆与众多河间府名士成为好友的。

如今，北京的数百家会馆大部分已消逝于历史的云烟里，河间会馆的遗址也渐渐鲜为人知。只是，那一段河间府才子们重诚守义、积德累善的故事，永远值得人们赞叹、感怀。

着故土，念着家门口的铁狮子。二爷、三爷、三叔也不例外，来信问候故里亲人，不忘询问铁狮子的情况。居于铁狮旁的敖国军有早起锻炼的习惯，常去铁狮子那里走走看看。现在铁狮景区修缮得更好了，前来瞻仰千年铁狮的人越来越多，沧州的铁狮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绵延和传承。看着眼前的巍峨雄狮，想着祖祖辈辈走过的足迹，定格的瞬间，敖国军希望一切如愿，幸福长远。



“朝阳寺”上唱大戏

李占武

亭子河从衡水市武邑县纵向流入泊头市后，穿越亭子河村婉转北流。在村东北方向几百米的西岸，竖立着一座又高又大的光秃秃的土岗子。这就是历史上曾远近闻名的朝阳寺遗址。

一

年久日深，风雨侵蚀，逐渐把遗址抹平了不少。上世纪60年代初，我跟着家里人常去朝阳寺赶庙会、看大戏。从那时起，就知道了原来朝阳寺竟是一片布满砖头瓦块、长满生命力极强的野草的荒芜废墟，远远看上去比地平线高出许许多多。

亭子河在流入泊头市境内上下仅仅几公里的地域间，是衡水和沧州两市的结合地带，也是阜城、武邑、武强三县和泊头市、献县5个县市相互毗邻的交会处。之后转向东北至大陈庄村西南角横穿106国道流入献县境内，逐渐向东延伸汇入老盐河至黑龙港河及南排河，穿越大运河流入渤海。

从朝阳寺遗址废墟的占地面积与大土岗子的高度来判断，可以看出当年的朝阳寺称得上是一座相当大规模的建筑群体。然而，至于朝阳寺究竟兴建于何年？兴盛时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修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漫地大洼里？出自什么原因、毁于什么年代？等等。自古至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即便如此，朝阳寺在老百姓的眼中，依然有着相当了不起的名气。这种名气的来源，来自在当地民间流传甚广的朝阳寺有一个“虚”一“实”一传说这三个方面的凭证。

一“虚”是：一段有关朝阳寺的顺口溜：朝阳大寺，铜梁铁柱，房屋八百余间，殿堂高大如山，铃铛一晃荡，百里传遍响，大和尚九百九十九，小和尚赛过牛毛……说的就是朝阳寺在当时的规模之大。

一个“传说”则为：朝阳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朝历代凡事都没人问、没官管的地方。按当地老百姓的叫法，这里纯粹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每当附近有村民打仗闹架时，双方都会在气头上说出“不怕死的，晚上去朝阳寺”的话语来，那意思是说“三不管”的地方打死人不用偿命。

一“实”，就是每年农历“三月三”朝阳寺传统的赶庙会。从三月初三持续到三月十八，连赶半个月才结束。

二

三月三，河枯干。在每年庙会之前的几天，朝阳寺脚下亭子河干涸的河床内，南北几里长的地方，早已是店铺林立、棚滩遍地。周边方圆数十里的村民们更是像逃荒避难似的或套上大车或牵赶着骡马大牲口，扯家带口地从四面八方赶到庙会上，早早地打起了地摊。一时间，各种腔调的吆喝声、叫卖声、喧嚷声及嬉笑声，忽高忽低、此起彼伏，传遍了长长的河床内外。

在起先庙会预赶的几天里，最热闹最红火的要数那些买卖摊铺。然而在“三月三”这天庙会开赶后，人们就被“唱大戏”的大土岗子吸引了过来。从庙会开赶前的进场到散场近半个多月里，大土岗子顶上聚集了当地十几家戏班子及社火会前来耍玩艺儿、唱大戏。他们根本用不着搭戏台，而是任意

选择一处地方摆起桌椅、敲响锣鼓就开锣唱大戏了。

在这些戏班子中，论名气要数亭子河村三大爷的戏班子。不但角色最为齐全，戏唱得最为出彩儿，叫好声更是最多最响的。就连周边三五十里村庄的老百姓看来，三大爷戏班子的角儿个顶个的厉害。前来看大戏的观众，绝大多数也都是冲着三大爷戏班子来捧角儿的，为的就是多看一眼他们拿手的表演，多听一段各自精彩的唱腔，也好过一番戏瘾。

凭着东道主的优势，三大爷戏班子照例是年年打头阵，登上大土岗子抢先开锣打场的第一家戏班子。待“三月三”庙会开赶之日，即是各家戏班子正式亮相的首场演出，各个戏班子都铆足了劲儿把最好的戏排在了首场。三大爷依照日期把一连数天的演出戏码，安排了个满满当当。到首场大戏开演这天，早早地就招来了几天前远道而来的大批观众。而三乡五里邻近村上的人们，就像是过大年起五更似的还没等到天亮就开始起床动身了。再等吃过早饭之后，已经三五成群地排起了长队，人们或扛着长条板凳或提着马扎及草墩敬苦子等，有说有笑地朝大土岗子涌去，为的就是抢个靠前面的好位置。而赶早到场的人们早已在三大爷戏班子台前的斜坡下面的空地上找好了自己的座位。日升三竿多高时，先后赶到的观众们黑压压地坐满了大土岗子四周的空地上，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偌大的岗子围个满满当当，等待着开场大戏的锣响。

三

从早到晚，十几家戏班子在大土岗顶上歇人不歇戏、换员不息场地轮流登场，而观众们则是随着戏班子“连轴转”式地边吃边看戏，哪里唱得精彩就跑到哪儿观看。

虽说在大土岗子周围看戏的观众挤了个人山人海，皆因土岗子又大又高会使前丘后远每个方位上的观众都能听得清楚、看得真切。前面邻近的老人们席地而坐，很舒坦地欣赏着三大爷戏班子的精彩大戏，而站在远处的年轻人则是个个长颈鹿似的伸长了脖子、踮起脚跟紧紧盯着精彩的演出。再看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群一伙的无拘无束遍地撒着野，嘴边边唱着：“朝阳，大土岗，大戏唱得好又响，大土岗，高又高，看戏拔腿又伸腰……”

有的孩子跑累了想看戏时，便吵嚷着让大人把自己举到肩上去或坐骑在脖子上，洋洋得意地歇着脚。在他们眼里，跟着大人们来到大土岗子上不是来看戏的，只是图个好玩，跟着瞎凑热闹而已。

接连半个多月的演出使四邻八乡的观众一下子看足了一年的大戏，实实在在地过饱了戏瘾。随着年代的更替和时间的推移，在后来的岁月里，大土岗子上戏班子的大戏也因朝阳寺庙会的日趋萧条而逐渐稀落下来，而周边乡村的老百姓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去朝阳赶庙会了。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已去，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渐渐地忘掉了朝阳寺，也忘记了“三月三”庙会，更慢慢忘记了大土岗子和戏班子唱的大戏。经过风霜雨雪的侵蚀与冲刷，以前又高又大的大土岗子似乎也低矮了许多，朝阳寺的名字从此也不再响亮，甚至变得陌生。